

现代资产阶级科学技术进步理论述评

傅 殷 才

当前,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大谈起科学技术进步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应当如何看待他们的理论呢?

—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或者是财富的分配。李加图在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就曾承认:“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的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①。除了古典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既不研究生产关系,也很少甚至完全不研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所谓“收益递减规律”,是以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的,马尔萨斯就是以“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把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现象说成是普遍的人口规律。甚至古典学派的伟大代表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有时也完全不考虑技术进步。李嘉图的这种观点,充分反映在他的级差地租学说上,他断言,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追加投资,总收获量不是递减减少,而总是与投资量成比例地增加,那么,就不需要从优等地过渡到耕种劣等地,因为对农产品的全部需求,都可以用在优等地上连续追加投资来满足。他写道:“如果优良土地的存在量远多于为日益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所需要的量,或者是在旧有地上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资本,且无报酬递减现象,那么,地租便不会上涨,因为地租总是由于追加的劳动量所获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生的”^②。十分明显,李嘉图在这里就是以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的。

大家知道,凯恩斯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在可用资源的数量 and 生产能力既定的条件下,产量和就业如何决定,如何变动。凯恩斯把“不变因素”当作经济体系中的决定因素之一,而所谓不变因素之中就包括现有生产技术,认为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在短期内的影响微不足道。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主义者,仍然坚持“收益递减规律”,认为它是“一个经常观察到的经济和技术的主要规律”。著名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在他那本风行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指的是:当我们连续地把同单位的可变投入量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某种其他投入量上时,我们所得到的增加的出量是递减的”。他还公然写道:“收益递减告诉我们,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和印度,生活标准低下的原因即在于这一基本技术上的真理,而不仅仅由于土地被国家或地主私人所占有”^③。

不过,事物总是变化着的。过去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不研究科学技术或以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现在转到大谈科学技术进步,用纯技术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大变化了。

最初强调科学技术作用的是凡勃伦和熊彼特。凡勃伦(Th·B·Veblen, 1857—1929)是

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改良方案，主张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应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掌握，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在这个改良方案中，凡勃伦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甚至企图证明，由于技术的发展，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计划经济。凡勃伦的这种观点，为现代的制度学家如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和贝尔(D·Bell)等所继承和发展。

熊彼特(J·A·Schumpeter)是美籍奥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理论”，以后又在他的各著作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创新理论”的特点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熊彼特断言：一旦经济技术进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渐减弱，“投资机会”逐步消失，“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④总之，在熊彼特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即垄断资本集团如洛克菲勒之流“不断革新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自动化”，因而使得“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技术革命，如电子计算技术迅猛发展，熊彼特的理论更加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资产阶级五花八门的科学技术进步理论，无非是熊彼特理论的引伸和发展。

当前，鼓吹科学技术进步作用最突出，因而影响也最大的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托夫勒(A·T·Toffler)、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奈斯比特(J·Naisbitt)。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1980年)中指出，人类迄今已经历了两次文明的浪潮：第一次浪潮使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第二次浪潮使人类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现在人类又面临第三次文明浪潮的冲击——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即所谓“超工业社会”。托夫勒不仅描述了新时期工业和技术的变化——计算机、全球电子系统、新能源、遗传工程、向空间和海洋进军等等，而且还描述了在此基础上引起的就业、家庭、社会组织、价值观念、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他还认为，科技革命是“工业社会”向“超工业社会”转化的基础，甚至称科技革命为“超工业革命”。他竭力使人相信，“超工业社会”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完全新的社会”。托夫勒声称，西方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经进入“超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

奈斯比特于1982年发表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从十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美国已变成“信息社会”。他虽然在科学技术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和在未来预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值得引起重视的看法，但他的基本经济理论观点同托夫勒等是如出一辙的。

总之，资产阶级学者不谈技术进步也罢，一谈技术进步，就千方百计利用技术进步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编造辩护理论，并且以科学技术进步的旗手自居，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忽视科学技术进步，诬蔑社会主义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

上面提到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以及其他研究科学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虽然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在细节上存在着分歧，但莫不强调科学技术的特殊作用，具有以下共同点：

1. 强调政治经济学诸范畴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反映或表现，强调生产技术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从技术进步决定社会性质的“理论”出发，大肆宣扬当前的时代是“自动化时代”，“技术时

代”、“信息时代”、“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超工业革命时代”等等，矢口否认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时代，资本主义似乎已经由于技术进步消灭了它所固有的矛盾，改变了它的性质，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断言，在由于技术进步而使资本主义本性已经改变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和矛盾都已经克服或正在解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或正在消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决定因素不是劳动，而是机器、技术；利润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在科学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工业技术的产物，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例如，奈斯比特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我们必需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①他们还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保证资本获得利润，使资本家乐意增加新的投资，扩大生产，因而危机可以减缓甚至消除。他们还企图用技术进步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失业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企图用技术进步来否认失业的存在，宣扬由于技术进步不平衡，它不能同时扩展到一切部门，失业只能是局部的，在一个经济部门产生的失业，迟早是要被其他部门所吸收。

2. 借口工人阶级队伍的某些变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例如，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由于“技术发展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不应再以财产状况来区分阶级，而应以受教育的状况来区分。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有知识的人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加尔布雷思公然写道：“在美国，怀疑与愤怒不再指向资本家和单纯有钱的人。人人带着忧虑和惊异望着知识分子。这不会使任何人惊讶。当半文盲的百万富翁挺身而出领导或经济上支持没有知识的人反对知识特权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区分”^②。同样，奈斯比特把“1956年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事实，说成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崭新时代的诞生。^③他们都兴高彩烈欢呼“可咀咒的无产阶级”的消失，认为资本主义已和平地、自动地进入非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或“技术社会”，或“信息社会”等等，贝尔就曾经写道：“不一定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制度必然从旧制度‘孵化’出来……后工业社会的根基，应在科学对生产的影响中寻找……科学作为半独立的力量正在使资本主义消失”^④。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大谈技术进步，竞相提出各种“新理论”、“新社会”，莫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托夫勒就毫不加掩饰地写道：“……我们走出工业群体社会稍远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更难站得住脚了。因为群众和阶级在正出现的第三次浪潮文明中，大都失去了重要性”^⑤。

3. 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捏造种种谎言，说什么收入分配，工人生活状况，均由技术决定，谁有了技术或信息谁就有了收入，而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关系；说什么贫困是由于技术落后，富裕是由于技术发达；说什么“我们经济中的技术愈进步，那么愈早可能把所有的人，或更正确地说把所有的家族变成资本家”。加尔布雷思早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就写道：现在，技术发达的美国已经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比饿死的还要多”，富裕到“特别是男人，有时故意把衣着穿得破烂一些”。他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为降低，低收入者的情况已“急剧改善”，似乎由于生产量激增的结果，“作为一个经济问题，贫富悬殊已不大为人注意，在现代社会史上，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⑥托夫勒也跟着加尔布雷思说：“超工业革命将结束饥饿、疾病、愚昧和残暴行为”，超工业革命“将为发展个性，为新的感受和高兴提

供新的机会，它使生活变得格外美好，有极大的可能性使人人兴旺发达”。除此以外，他们还利用技术进步作为幌子，鼓吹为了大众福利实行技术革命，必须免除垄断资产阶级的纳税义务，或者让它少纳税，把税负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4. 竭力替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效劳。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打扮成技术进步的旗手，似乎它是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的榜样，仿佛它可以“无私地”提供技术援助，企图用这种谎言诱使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第三世界人民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但是，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的言论还是暴露出了为新殖民主义效劳的本质。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出新任务、新措施时写道：“美国目前有两种经济：一种是朝阳经济，另一种是夕阳经济”，“显然，昨天已经过去，随着第三世界准备接收主要的工业行业，发达国家必须转入新的行业”。在这里，非常明白地规定了第三世界必须保留和发展落后的工业，同时却大声疾呼：“我们（指美国——引者）必须放下旧工业，肩负起致力于未来新工业的任务”。⑩托夫勒则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大肆鼓吹小生产、分散性、自产自销等的优越性，说什么“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比起它们与第二次浪潮来，似乎有着更多的共同处”，企图使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处于“第一次浪潮”的不发达状态，永远遭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剥削和压迫。

三

十分明显，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大谈技术进步，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上述的一切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符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一一作出分析批判，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科学技术进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倒成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旗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尤其是在研究经济理论时，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远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还处在开始形成的时候，就从科学技术进步出发，批判了马尔萨斯以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的人口理论。例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中写道：“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⑪。尔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⑫，时刻关心当时每一自然科学领域包括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等研究的重大进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没有一个人能象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⑬。恩格斯自己对技术进步同样十分关心，在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写了不朽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列宁也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在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从哲学的高度光辉地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首先是物理学的最新成就，科学地预见到这些成就将给科学的发展以巨大的，真正革命的推动力。列宁在刚跨入二十世纪时就指出：“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⑭。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更是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亲自主持制定电气化计划，提出了著名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公式。

可见，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人，不是无视了政治经济学史

中的这些重要事实吗？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理论时，长期忽视或蓄意抹杀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只是在近数十年来，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才不得不采取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手法，研究起技术进步来了。当然，不管他们抱着什么目的，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但是，我们决不会也不应当放弃对他们在研究上的反动倾向和错误观点的批判。

其次，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根本缺陷是完全抽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纯技术观点或“技术决定论”出发，因而得出一系列错误结论。

大家知道，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起来。因此，必须从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把一定的社会制度看作是决定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基本条件，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大批失业等等，因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发挥等等，因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道路。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技术进步时，完全离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鼓吹资本主义已经或者将会自动地进入非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经济危机、失业等）。这一套论调是极端荒谬的。事实上，技术不能自动地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

再次，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故意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反复说什么“不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⑮都一样，似乎科学技术进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能起到同样的重要作用，都能给劳动者带来幸福，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了资本主义制度。

诚然，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科学技术可以成为不同阶级的工具，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服务。技术进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的影响，是不能比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为劳动人民自己所掌握，“使科学技术不是用来为一小撮人发财致富，腰缠万贯”^⑯，而是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技术基础，它完全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资本家用作发财致富并“使工人从属于资本”的手段，只能加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加深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使劳资矛盾更加激化，使经济技术上落后的国家更加遭受侵略和欺侮。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⑰。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进步的作用和影响是这样的不同，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却蓄意把它们混淆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快，为人民谋福利等等优越性，强加在资本主义头上，然后把资本主义捧上天，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丑恶面目。

最后，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述和有关原理，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反

映了，但以歪曲的形式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科学技术进步的某些特点，这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具体经济技术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例如论述了新的技术革命将以新的能源技术、新型材料、海洋工程、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六大科学领域为代表，其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材料科学将成为“新产业革命”的主要支柱。他们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现在正从工业社会转入信息社会，或叫知识、智力社会。他们说，信息社会就是“大量生产知识”，“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⑨。因此，他们强调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和采用，需要有创造和驾驭它的专门人才。目前，西方国家根据这些意见，正在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倾注巨大的力量。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具体意见，对我国的“四化”建设来说，其中许多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

注释：

① 《李加图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278页。

② 《李加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页。

③ 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0、36、41页。

④ 参阅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166页。

⑤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波士顿，1971年第2版，第247页。

⑥ 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

页。

⑦ 贝尔：《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一个大胆的社会预想》，纽约，1973年版，第378页。

⑧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8页。

⑨ 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2页。

⑩ 奈斯比特：《大趋势》，第70、57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页。

⑫ 同上，第19卷，第372—373页。

⑬ 同上，第19卷，第372页。

⑭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0页。

⑮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2、32、34、114、354页。

⑯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6页。

⑰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2页。

⑱ 奈斯比特：《大趋势》，第15页。